

中共舉辦二〇〇八年奧運

■葉丁鵬、林芬蘭

對中國大陸政治發展可能之影響

現代奧運創始於1896年，迄今已有107年歷史和傳統，這項國際間最具歷史性的賽會，是由法國男爵古柏坦倡導。於1896年在古代奧林匹克發源地的希臘雅典舉行，每四年舉行一屆的奧運如今成為各國透過運動競賽的方式，展現國力的重要場所。從1894年洛杉磯奧運籌備會主席尤伯羅斯運用企業化經營手法，將奧運商業化後，使得舉辦奧運成為兼具賺錢的行業，更有助提升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形象，申辦奧運遂成為各國爭相努力的目標。

雖然，國際奧會前主席薩馬蘭奇一再重申「體育完全沒有政治」，「現代奧運的理想與宗旨是建立一個和平美好的世界」，但體育與政治之間從以前到現在，卻都與政治的運作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從奧運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到奧運代表團的會旗和國家名稱的爭執；從冷戰時兩大陣營對奧運會互相抵制，到慕尼黑奧運上的政治謀殺等，奧運無時無刻不與政治劃上等號，體育不僅包含著政治的目的，而且包含著政治手段；體育不僅是一個緩解互相仇視、打破歷史成見的實驗場，也是一個加深彼此隔閡和偏見的實驗場。

問題背景

中國人很早就有舉辦奧運的念頭，早在1908年「天津青年」在一篇名為「競技運動」文章中就向國人提出三個問題：「中國何時才能派出一位選手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才能派出一支隊伍參加奧運？」「中國何時才能舉辦奧運會？」嗣於1945年，當時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在重慶召開會議，由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國際奧會委員王正廷和著名的體育家董守義等提出「爭取第15屆奧運（1952年）在我國舉行案」，雖獲得當時全體與會人員一致通過，惟迫於我國所處的歷史條件，並不符合舉辦奧運的要求，而形同具文，1952年的奧運落在赫爾辛基舉行，我國爭辦之說，亦僅止於空談。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即以「新中國」自居，並於當年10月26、27日在北京召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籌備會議」，朱德在會中指示：「體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體育事業一定要為人民服務，要為國防和國民健康利益服務。」翌年中共即派出第一個體育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體育運動組織及其發展，作為中共發展體育的參考，奠定中共重視體育之基礎。

中國大陸於1970年代推展「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深深體會並了解體育的政治效能，以致全力發展體育。之前中國大陸因和我方在國際奧會中為了「一個中國」的名稱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憤而於1958年宣布退出國際奧會，在奧運門外徘徊26年後。中國大陸於1984年重新派遣了一支353人的龐大代表團重返參加洛杉磯奧運，並一舉奪下15金8銀9銅，總獎牌排名居世界第四強。2000年的雪梨奧運中共在獎牌榜更超越體育史上強國德國，躍居「第三強」，引燃起中共申辦奧運的雄心。

中共前總書記鄧小平於1990年7月3日參觀為舉辦第11屆北京亞運新建的國家奧林匹克中心時，陪同參觀的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和北京市長陳希同提出辦完亞運就要辦奧運的構想，鄧小平說：「你們的決心下了沒有？為什麼不敢幹這件事呢？建設了這樣的體育設施，如果不辦奧運會，就等於浪費了一半。」鄧小平的話向世界宣示了「中國領導人支持辦奧運」，並促使北京在翌年正式向國際奧會提出申辦奧運。

申辦2000年奧運城市：北京、柏林、伊斯坦堡、巴西利亞、曼徹斯特、米蘭、雪梨七大城市，巴西利亞、米蘭在1993年9月23日票選奧運城市前，因故相繼退出。

上開申辦城市之票選，於1993年9月23日在蒙地卡羅「賭城大飯店」舉行的國際奧會第101次年會投票中，北京卻以43票對45票輸給雪梨，兩票之差敗陣下來，使得12億多中國人陷入無比的傷心。

北京2000年奧運申辦失利後，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曾多次希望北京再次申辦奧運，但北京均予婉拒。經過八年的生聚教訓，同時中國大

陸大力進行改革開放，在經濟、政治、軍事及國際聲望都有長足進步，再度提出申辦奧運，用以提昇其國際地位的企圖。北京市遂於1999年4月6日第二次向國際奧會正式提出申辦2008年奧運，同年9月6日結合北京市政府、國家體育總局、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奧林匹克事務專家、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企業家和社會知名人士組成「北京申奧委員會」。終於在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奧會第112次年會投票中，在第二輪即以過半數的56票，大敗22票的多倫多、18票的巴黎、9票的伊斯坦堡，贏得2008年奧運舉辦權，為有5000年歷史、13億人口的中國，贏了首次奧運舉辦權。

■申奧後，中國大陸政治政策趨勢的探討

北京申奧成功，部分持悲觀立場的觀察家立即將2008年北京奧運與1936年納粹柏林奧運及

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相提並論，灼然指出奧運的舉行並沒有阻擋德國出兵波蘭，甚至成為希特勒宣揚納粹主義的舞台；蘇聯仍照原定計畫向阿富汗揮兵，侵略的行徑並未因而終止；如此諷刺的歷史教訓，猶如昨日，是以，我們不得不對中國大陸舉辦奧運之政治及軍事立場之轉變，不抱存任何幻想。

另一持樂觀看法的人，則認為如今時空環境背景迥異，以現在世界逾90%以上是民主國家。不若1930年代有相當多的獨裁國家，且國際環境講究合作、雙贏，不似以往單打獨鬥的型態。是以，1936年柏林奧運後十年，納粹德國垮台了；而1980年莫斯科奧運後，也是十年的光景，柏林圍牆崩場，埋葬了前蘇聯的共黨勢力等局勢的轉變，對於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中共政治的轉變仍然可以被期待。而預估北京政府在2008年的奧運之後，極有可能像1988年漢城奧運，不到五年的時間，選出30年來第一位文人總統，導致了80年代中葉以來迄今韓國的民主化。



▲2001年7月13日在國際奧會第112屆莫斯科年會會場上，我國籍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與中國大陸國奧會委員何振梁合影。
（圖片/國際奧會提供）

長期以來對亞洲問題及中共內部研究極其關注的美國學者Chalmers Johnson就是持這種看法，他甚至指出2008年北京奧運將會使中共內部更進一步的自由化。

以上這些問題在北京申奧前後，極受研究中共問題及奧運的專家、學者關注，惟可能都難有決斷性的答案。從過往奧運對主辦國家所帶來經濟、文化、外交及政治上的發展皆有其不容忽視的助益來看，奧運對於中共在這些層面的影響亦是必然的，然而卻都必須相對

地付出代價，以中共此刻力求改革開放，及高唱「三個代表」的熱門論調而言，其對經濟發展、文化推展方面的正面影響，已昭然若揭，而政治層面所帶來的潛藏性推力，主、客觀因素複雜，較難有急成性的定論，本文僅就其內、外在政策形勢之影響及趨勢析述如下：

(一) 從國際地位上來看

奧運獲得金牌必升代表團團旗的光榮盛大場面，不只是個人的榮耀，也是國家的榮耀。對中共來說，由國際奧會賦予主辦奧運的資格，雖然體育與政治非有必然之直接關係，但無形中莫不有代表國際上對這個政權的肯定，中共之所以卯足全力爭取主辦的機會，意在希望政權的「正當性」獲得肯定。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處於冷戰圍堵的孤立狀態，即使鄧小平復出，使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但為世界所矚目的大多是負面的形象，如人權不彰、強迫墮胎、童工等事件，甚至縱使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國力增強，也被視為對鄰國經濟的威脅，北京當局欲改變這種被烙印不友善、霸道、不人道的暴發戶形象，祇能藉由各種國際會議及議題，加強國際活動及能見度，而主辦奧運，正是滿足這種心理需求的重要成就，向世界宣示中國的國力及影響力，並藉由此全球性的體育活動來表達其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改變其窮兵黷武的霸權形象，向世界傳達善意及進步的信息，以助於其國際地位的提昇，亦可促進其全方位的開放。除上述對改變國際視聽有所助益外，對於其影響內部政治的民主化，是可被樂觀期待的。

(二) 從外交上來看

申奧成功帶給北京的重要意義是，國際奧會

信任大陸的體育設施及選手，以及其當局辦理奧運行政的能力；換句話說，申奧成功給足了大陸在外交上「面子」。從申奧成功後，江澤民立即飛往俄羅斯與普汀簽訂友好協定，在在證明申奧成功後，加重了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縱橫的籌碼及資源。

北京在增加更多國際外交份量後，在國際社會中是會更講理？還是更霸道？國際社會在1989年六四後，對北京採取全面制裁，卻未成功。之後，以美國柯林頓政府為代表的西方左傾執政陣營，乃改採行比較溫和的中國政策。由於受到大陸巨大市場的誘惑，歐洲部分國家在這方面甚至採經濟至上的方式待之，與原來制裁政策愈行愈遠。

回顧北京的外交政策，在中美建交、到蘇聯瓦解前，一直保持「獨立外交」的作法，避免淪為美、蘇兩大超強國家對抗下的犧牲品；而後冷戰時期，則在「一超多強」的國際新秩序中，以「國家安全」作為最高的戰略目標，若根據這種說法，申奧成功，並不見得會改變目前的外交策略。然大陸尚一心一意要扮演好奧運主辦國的角色，在奧運舉辦前，勢必要採取較溫和的姿態，在國際社會裡扮演區域強權的態勢應有所檢點而趨向和緩。又其在奧運贊助廠商的爭取及經濟需求上，亦迫使其暫時收斂其一向強勢、蠻橫的作風，以博取世界各國的好感及認同。

(三) 從政權及統治權上來看

北京申奧的成功給予江、朱在權力接班上，有了較大的籌碼及在位執政的績效，尤其在去(2002)年11月舉行的「十六大」上，江澤民的威望已達到頂點，胡錦濤穩定接任中共黨總書記及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以繼續推動改革開放政

策。至於江澤民本人則續任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處理敏感的美、台、大陸事務，以及調節、安撫解放軍的鷹派，繼續扮演集體領導幕後推手甚至垂簾聽政的重要核心角色。

另一方面，由於2008年辦好奧運的壓力，亦迫使江、朱權力核心必須力圖穩定政局，鷹派與黨內持反對意見者之間，妥協的機率也會比較大。譬如原預定在大陸各試點舉行的鄉、鎮長選舉，可能會在展示其民主進步的意圖下，擴大或全面實施，以成為吸引世人到北京參與奧運的籌碼，而加快基層民主化的速度。

惟江澤民於去（2002）年5月31日向包括中央委員會要員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發表的演說中，重申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並且拒絕西方式的民主改革。顯示在其政治權威尚未消失前，中國大陸立即實施真正民主改革的機率，幾近於零，至其第四代接班人及領導權轉換後的政治發展及改變，在其經濟開放腳步愈來愈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逐漸完全取代共產體制的過程中，為符合國際的規範期待及民衆思潮需求，在穩定共產黨領導地位及「穩定重於一切」的框架下，民主化程度的逐步演變還是值得被期待及觀察的。

（四）從人權上看

北京申奧期間，一些藏獨人士曾聯合加以抵制，甚至流亡美國的大陸籍知名異議人士魏京生（魏曾於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辦奧運前被釋放，申奧失敗後又遭逮捕，直到1997年才在美國等民主國家的壓力下被釋放），亦嘗試申請前往莫斯科說服各國際奧會委員，勿投票予北京，並於華爾街日報發表專文，堅決反對北京主辦2008奧運；這些行動最後雖未能撼搖北京拔得頭籌的地位，但除上述主要反對者外，其他競爭城市，

諸如多倫多、巴黎、大阪、伊斯坦堡及反對人士均異口同聲表達『若北京順利申奧，就等於是縱容大陸繼續忽視他們的人權問題』的指責。

大陸奧會秘書長屠銘德為使北京順利達成取得奧運主辦國的目的，一再對外表示，「我不能說能改變多少，但至少有助」，「相信國際奧會委員們會明白，這是一種挑戰，我們會盡我們所能，來贏取他們的信心」；足見北京奧運對大陸人權的改善，僅可視為「催化劑」而非「萬能丹」。

國際特赦組織設在倫敦的總部，在去（2002）年六四13週年前夕發表一篇聲明指出：『「六四」受害者的圈子每年都在擴大」，『一些企圖紀念「六四」的人，不斷被逮捕入獄」，『甚至一些在網路張貼類似訴求的人，也遭受到相同命運』；更明指因為直接參與八九民運或之後參與有關活動被捕而繫獄者，至今仍有二百人。可見大陸人權問題已被世界各國定位為亟須積極改善的國際性議題，尤其，大陸當局目前將釋放民運及政治異議人士，以為參與國際性活動、組織的磋商談判籌碼之做法，可見其人權問題的嚴重。此與一向強調和平、正義的奧運宗旨，明顯背道而馳，國際奧會於世界各國的輿論壓力下，曾於2002年4月間，揚言中國大陸人權問題若無法有效改善，將研議取消其主辦資格，這種嚴厲的言論是以往從未發生過的，未來北京是否會因此被取消主辦國資格，不僅考驗國際奧會的魄力，亦考驗北京當局的智慧。是以，可以斷言，在中國大陸極權政治體制未能澈底變革前，人權問題的根本解決，是不可能的。惟我們相信在未來六年中，為讓世人對於北京辦好奧運有信心，其必定會嚴厲打擊社會犯罪，維護治安秩序，有條件的改善



▲紀政發起「北京奧運·炎黃之光—海峽兩岸長跑」活動（杭州站實景）。（圖片/希望基金會提供）

其人權狀況，宣示性及表面性對異議人士採取較寬容的態度。

（五）從兩岸關係上看

北京申奧期間，由我方田徑女傑紀政發起、大陸全國體總共同主辦的「北京奧運·炎黃之光—海峽兩岸長跑」活動，於2001年6月14日至30日從台北起跑、途經高雄，再抵深圳、經寧波、杭州、上海、無錫、南京、青島、北京，掀起兩岸人民支持北京申辦奧運的高潮，我除民間團體、個人的動員支持外，當時的總統府祕書長張俊雄亦在2000年7月3日邀集行政院體委會主委許義雄等人開會討論，達成「支持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立場」及爭取奧運分項活動在台舉行的共識。我方唯一有投票權的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甚至在國際奧會正式投票前，一再對外表明支持的立場。可見兩岸在申奧的議題上，口徑顯然是完全一致的。

在一片兩岸體育大團結的氛圍下，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終於提出對兩岸未來關係發展的看法：「北京申奧成功並不代表中共（中國）未來七年都不會對台動武」。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北京在遵守奧林匹克憲章精神及奧林匹克「非戰協議」的同時，台海能不能因為有了北京舉辦奧運的保護傘，而免於戰爭？

倫敦金融時報特別指出：「只要台灣在奧運之前不去挑釁中共，它不致對台灣採取侵略性的路線」，陸委會副主委林中斌在北京申奧成功後之對台政策上，認為「有關北京的對台政策……其中軍事現代化的進展是不會減緩的，只是武力衝突的可能性下降，至少短期內軍事手段是會受到限制」；另由中共對美國建置飛彈防禦系統（NMD、TMD）的反對態度，及其近期不斷向俄羅斯、以色列等武器輸出國家購買先進武器、積極研發國防科技等動作，實很難看出它的態度會

因主辦奧運而有軟化的跡象，且其對台的軍事政策亦未曾動搖過。

換句話說，兩岸關係未來因北京主辦奧運而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可謂微乎其微，惟在北京因迎接奧運大刀闊斧從事建設，必然牽引著兩岸在經濟關係上的消長。至中共是否會恪遵奧林匹克憲章所揭櫫的精神及規範，仍頗值得繼續觀察。

(六) 從環境保護上來看

1994年國際奧會與聯合國環境計畫署簽訂合作備忘錄，共同致力於環境保護。1996年國際奧會制訂出環境保護政策，其第三條對所有奧運申辦城市提出環保要求，對奧運舉辦城市的選舉中，必須對申辦城市的環保計畫進行評估。所以，北京申奧過程中面臨的環境壓力，主要因環保問題關係著生態、生活或社會等的持續發展與否。

北京申奧委員會對國際奧會所作的承諾，實質上是對世界人權要求中「人的生存權」的承諾，因「中國大陸的一些大城市硫含量居世界最高水準，大大高於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標準；地球上1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有7個來自中國大陸」，過去20年，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是伴隨著對環境毀滅性的破壞，以致水旱災頻繁，工業污染日益嚴重，土地荒漠及沙化快速，並使大城市人民罹病人數大幅增加。儘管中共多年來採取的環保措施已獲致了一些成效，使工業污染物排放量減少了17%，退耕還林和退耕還湖等已使環境破壞程度減緩，但環境的狀況仍與低污染的標準有差距。預定1998年到2008年將投入120億美金實施北京地區的環境治理及保護計畫，於奧運舉辦前一年，將北京城區的大多數工廠搬遷到城區

外，城區至少一半的面積將被樹木和草坪所覆蓋，所有的固體垃圾和90%的污水將得到處理；為了減少居民和企業對高污染煤炭的使用，將不斷進行天然氣輸送管線的建設，達到天然氣取代煤炭的目標。

惟這些計畫是否會在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下，使整個環保計畫打了折扣而影響其成效，另其在奧運舉辦完後，環保的被重視程度是否能繼續？工業經濟發展政策是否能與環保政策在政治的槓桿上取得平衡，亦須持續關注。

■ 結語

回顧這次北京申奧過程，北京固然在硬體設施、財力及市民參與與國家支持方面的表現十分耀眼，但人權議題的指責，卻是此起彼落。在某種意義上，對國際社會而言，北京是拿到了主辦權，但後續的監督才是投票支持者心中最神聖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和平演變將不只是國際社會的策略，而實際上已鑲入中國大陸的內部，並從最敏感的政治中心出發，不斷呈現在中國大陸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化過程中，成為其無法逃避必須面對及解決的急切課題。

然而，在中共「走自己的路、務實、發展、穩定」的政治主流下，還只有經濟體制的改革，缺乏政治民主的改革，必定會帶給大陸諸多內外不利因素，這些不利因素，可用北京民衆流傳的一段順口溜來表達，即「江主席站在天安門廣場，往東看，走私油輪在靠岸；往南看，四百萬個貪污犯；往北看，百萬工人在下崗；往西看，全部都是窮光蛋；往上看，美國飛彈在亂竄；往下看，法輪功還在轉；往後看，接班人在往前



▲薩馬蘭奇在瑞士洛桑辦公室與我國籍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合影。
(國際奧會提供)

站」。這些因素，既是中共「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矛盾的禍果，有可能導致未來中國大陸社會不穩定、極權領導地位動搖的不定時炸彈。

不諱言，北京申奧成功對經濟發展是一大利基，據中國大陸統計專家的估計，如果每年就業人口增加1%，到2008年奧運開鑼時，北京城鎮職工將增加40萬左右；惟去（2002）年中共勞動暨社會保障官員指出，未來四年新增的失業人口將會超過2000萬人，兩相對照下，主辦奧運所增加的就業機會，仍不敵失業人口的增長；失業率的攀升也意味著人民生活愈趨貧困，奧運所帶來的商機及經濟收益，儼然無法撫平社會問題日漸尖銳的事實。因奧運藉旅遊而來的民主人士，可能使北京當局頭痛的法輪功社會人權問題，成為世界關注討論的議題。此等社會問題，是北京在熱烈慶祝申奧成功的同時，必須有所警覺及正視的重要課題。

雖然中共對台政策戰略不變，但戰術是明顯的愈來愈靈活，這可從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不離「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對台政策

主軸，於2002年「江八點」七週年座談會中，提出區隔台獨份子與民進黨員，以及對台灣打經濟牌等，不同以往「敵我」二分法的作法明顯看出端倪。在其明顯以「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氛圍下，提出「三通談判可不涉及一中原則」，以及三通可定位為「兩岸航線」的彈性說法，在在顯示中國大陸在其國力逐漸增強下，面對兩岸問題所展現的自信心。雖然，陳水扁政府自上台以來，即不斷釋放出緩和兩岸關係的言論，但面對中國

大陸的策略，仍無法有效打開兩岸陷於膠著的關係，達到大幅度進展；且台海軍事威脅陰影一日不除的情形下，寄望奧運的舉辦對兩岸關係能有「全面」改善的效果，又未免太一廂情願、緣木求魚了。面對兩岸優勢「時不我予」的消長挑戰，政府應改變過往輕忽體育運動發展的心態，轉而積極加強對國際體育競爭舞台的經營及關注，藉以提高我在政治舞台之外的國際能見度及影響力。

在面對中國大陸經濟、政治與國際關係愈來愈強大的壓力，及一連串國際舞台上的成就，如北京申奧及上海申博成功的態勢下，必須能有效提出「全面化、多項度」的因應及自處策略，才能有效預防台灣在各國際組織中被不斷的擠壓及邊緣化，如何掌握台灣在地理上、文化上、甚至政經自由化程度的優勢，維持以往主導的地位，積極加入各項國際組織，有效提升我國能見度及競爭力，爭取世界各國的尊重，是新政府團隊必須要有的施政期許。（作者為體委會全民運動處科長、競技運動處科員）